



# 黔北儿女多豪杰

本报记者 金泉泉 陆邱珊

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,遵义会议陈列馆的橱窗内,一幅“抗日先遣队行动路线要图”静静陈列,引来游客驻足参观。
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遵义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奔赴抗日疆场,前赴后继,英勇杀敌,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消息传到遵义后,各界人民同仇敌忾,愤怒声讨侵略者。”红花岗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董志毅说。

1931年10月初,遵义县城学生罢课,工人罢工,商人罢市。3000多人参与大游行,高呼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等口号。抗日救亡之火以燎原之势,在黔北大地迅速蔓延开来,15万遵义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吹响了黔北抗战的号角。

1932年秋,遵义在上海的学生、中共党员夏爵一等创办《黔人》刊物,向家乡介绍抗日形势。

1933年,中共党员余正邦从北平回乡,在省立三中和女中任教,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,传播新文化和爱国民主思想。1934年,中共党员周同和等人从四川转到遵义,在学生中成立“反日反帝大同盟”。

“一系列‘抗日宣言’,犹如声声号角,推动遵义地区抗日救亡斗争日益高涨。”董志毅介绍。从1938年至1941年,在中共遵义县委的领导下,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取得很好效果:遵义青年抗日救国会(简称“青抗”)创办了《活路》《游击队》等墙报,在城区要道、商店门口和近郊场镇张贴,宣传中共抗日主张。中共遵义县委安排“青抗”组织各校学生给八路军和抗日军政大学写慰问信;在丁字路口设“献金台”募捐,将募集的捐款买成大米和食盐,慰问抗日军人家属;组织歌咏队,深入城郊,演唱抗日歌曲和表演话剧等,并发展成为黔北抗日宣传活动的中坚力量。

为了推动遵义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,满足人们对精神食粮的需求,中共遵义县委决定在遵义城开办书店,开辟新的宣传阵地,传播党的抗日主张。1939年初冬,在老城大什字阁对面街口正式开张营业,书店名叫“快读书店”,秘密出售《列宁选集》《新华日报》等著作和报刊等。

“书店对传播革命理论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、激励群众抗日热情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。”董志毅说,书店还是1939年至1940年间联络贵阳、金沙、桐梓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重要交通站。

不仅遵义县(今红花岗区、汇川区、播州区)的抗日救亡斗争如火如荼,在桐梓、湄潭、仁怀、赤水等地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。

桐梓女小以党员和进步师生为主体,组织歌咏队,唱抗日歌曲,编印新四军英勇抗日击日军的消息等;湄潭、仁怀以学校为主要阵地,成立读书会,组织宣传队、歌咏队,逢赶场天上街演出《捉奸》《游击队之歌》等抗日剧和歌曲等;赤水成立了“流浪波社”和“读书会”两个抗日组织,创办了《少年大众》和《寒夜之华》刊物,以此为阵地,团结进步力量,积极宣传抗日救国。

为了支援前线抗日,遵义人民节衣缩食,积极捐款捐物,义务献工修路架桥。汇川区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官昌明说,遵义各地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义卖、义演,百姓千方百计捐款捐物。不少农民群众还把自家的辣椒、烟叶、鸡鸭蛋、牲畜甚至口粮,卖钱作捐献。据《贵州通史》记载,从1941年至1945年5年间,遵义全区在缴纳粮食方面占全省总量的22.05%。

在山河破碎、生死存亡之际,遵义儿女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,踊跃应征入伍,奔赴前线杀敌。据不完全统计,在14年的全面抗战中,遵义参加抗日的总兵员不少于15万人,占贵州省抗日总兵员的23.45%。

在抗日战争中,遵义籍中共党员和群众积极投身于挽救民族危机的抗日洪流之中。从捐款献工、救助遇险同胞到奔赴战场英勇杀敌,遵义人民并肩站立、携手行动,筑起打不垮、推不倒的巍巍长城!

# 对话自然 打开生态文学创作新视野

善待自然、善待生态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人与生态和谐共生、与自然和睦相处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。在倡导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发展理念的时代背景下,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的新时代,生态文学已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生长点。越来越多的作家、诗人投入到生态文学的创作中来。

为了打开生态文学创作的新视野,探索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,9月4日,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位作家、诗人、博物学者、哲学教授、建筑

教授等相聚绥阳县十二背后旅游区,参与到“生态:作为文学的方法”——生态文学与自然诗歌研讨会中,从各自的视角来探讨生态文学和自然诗歌的概念,以及生态写作的相关方法和理念等。

## 聚焦人与自然的关系

生态文学的兴盛是中国现实发展的呼唤与内在需要,时代的发展进步催生并造就了生态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,生态文学可谓风华正茂,绿意盎然。

著名作家、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对自然文学情有独钟,多年来,他一直比较关注文学作品之外的自然环境、植物学、动物学的书。他热爱到户外徒步、摄影,在青藏高原拍摄植物,至今已积累几万张照片。

与此同时,自然意识也渗透到阿来的虚构小说创作领域。比如阿来创作的获得鲁迅文学奖的《蘑菇圈》,便是他的“自然三部曲”之一。另外两部是《三只虫草》《河上柏影》,每一本书都跟高原上的一种物种相关,分别是虫草、松茸、岷江柏。

“文学应该多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,而且不要仅仅停留在象征意义上。”在阿来看来,当下的文学,多是聚焦人与人的关系,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,自然的丰富,却比较少触及。就算是触及,也不是专门关照自然本身,而是将自然作为一种意象的投射物。“它不再是自然物,变成了一种寄予我们情感的事物。”

阿来曾专门在唐诗中寻找真正且纯粹描写自然的作品,但只找到一首——唐朝边塞诗人岑参的《优钵罗花歌》。其中,“白山南,赤山北。其间有花人不识,绿茎碧叶好颜色。叶六瓣,花九房。夜掩朝开多异香,何不生彼中国兮生西方。”在阿来看来,岑参通过观察后的描述,客观而科学。

在此次论坛举行之前,与会嘉宾到绥阳县十二背后旅游区双河谷景区采风,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阿来告诉记者:“十二背后自然条件很好,旅游开发非常有序。自然界包含了很多美的元素,我们更应该知道美在哪里、美的价值和意义,这需要不断发现、不断言说、不断传播,文艺作品的感染力和持久力更强,才能不断揭示景区的生命力。”

当在双河谷景区的溶洞里见到久远古老的化石时,著名诗人、安徽省文联主席陈先发不由得惊叹:“在庞大的时间凝结面前,我突然感受到作为个体生命的人,是极其脆弱和短暂的。我觉得,文学在这种状况下,就能起到一种抚慰作用。”

自然与诗歌艺术有着漫长的亲缘关系。《诗刊》主编,被称为“自然诗人”的李少君认为,自然山水是诗歌永恒的源泉,是诗人灵感的来源。道法自然,山水启蒙诗歌及艺术。“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”,几乎是中国诗歌和艺术的一个定律。

“古人对自然的推崇,对当代诗歌也很有启迪意义。中国

诗歌强调境界其实与尊崇自然密切相关。在诗歌中,境界唯高。何谓境界?我的理解就是指个人对自然的领悟并最终与自然相融和谐共处。”李少君说。

## 刷新看待世界的方式

生态是人类栖息的家园;文学是人类栖息的精神家园;生态文学是人类精神与自然生态的美学家园。生态文学不但是生态+文学,而是文学与生态的生命融合,是生态走向文学的前沿,是文学返回自然的原乡。

中国作协副主席、非虚构写作者、资深文学批评家李敬泽,对生态文学这个概念进行了深入阐述。在他看来,人与自然的关系,需要重新认识、界定和想象。“这个问题,确实有古老的根脉,但当下我们所处的时代,给我们敞开了巨大的想象、认知和行动空间。生态文学不仅仅是讲人与自然和谐相处,它关系到在当代我们如何成为更好的人,如何更好地理解自然,理解自身,但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,自然可以给我们新的文学方法论,还可以刷新我们的世界观。”

李敬泽认为,当我们思考、谈论自然的时候,还是要认清楚,人与自然这个问题还是不能孤立起来谈,还是要放在与人有关联的生态系统去考虑。各种生态危机的出现,也促使我们人类从新想象和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。甚至重新定义人与自然的“亲密关系。”

前些天,李敬泽买了一个望远镜,他不望星空,而是“偷窥”家门口对面树上的三个喜鹊窝。“每天观察它们的生活,哪一天要是不看,我还会担心它们怎么样了。在这种意义上,我跟这些喜鹊建立了亲密关系。”

李元胜是诗人、博物旅行家、重庆文学院专业作家、重庆市作协副主席,同时他也是一位专业级的昆虫摄影师,出版过《中国昆虫记》《昆虫之美》《昆虫的国度》等作品。

一开始,李元胜进行自然摄影只是因为很感兴趣,他没想到这会跟自己的写作有什么关系。但是在大地上了十来年后,他发现自己写的诗,不知不觉已经发生了变化。

“平时在书房里想不到的题材、句子结构,会在户外自然涌现。我慢慢意识到,自然并不仅仅是我写作的一个题材,或者方法,它还改变了我的世界观。”李元胜进而认为,在当下,自然绝不仅仅只是文学写作题材的扩充,它还应该作为结构性因素进入当代文化,发挥更大的价值。

在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、一级作家陈应松眼里,大自然是我们古老的乡愁,生态文学就是浩荡的、壮丽的乡愁文学。“中国文学与生态文学联系得非常紧密。生态文学作为一种安静、纯

净、自省、慎独的文学,使作家和诗人参悟天地的真谛,探求万物的奥秘。无可厚非,这样一种智慧文学,为当下的文学生态提供了良好示范。”

## 探讨生态写作的表达

人与生态须臾不可分割。生态是人类的生存之需、生活之要、生命之本,生态文学其实也是人学,是最贴近人自身的一种文学样式。生态与文学可以完美地统一于人,作用和服务于人。

“当前,我们面临一个紧迫问题,生态与当代性、自然与无边的现实主义的问题,它们之间疏离、冲突又融合,生态文学如果无关我们的现实,生态文学的个体命运和当下困境,就是一种逃避。脱离了当代性去谈论生态文学和大自然文学,只是一次空谈。”著名诗人、浙江传媒学院教授沈苇这样说道。

因此,沈苇认为,今天的生态文学,要以当代性为切入点,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。从整体

论意义上重新认知,将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综合起来加以考察。而在写作方法上,要打破种种界限,将文学与生态学、博物学、社会学等融会,追求一种跨文化、超文本的品质和气质。

武汉大学文学院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张箭飞认为,作为一个概念,生态文学已经培育出多种多样甚至互相矛盾的界定,当然,它也在不断地修正既有的界定。她说:“根据我个人的阅读经验和偏好,我认为,生态文学要么通过精微而生动的记录,建构地方性的知识,例如《塞耳彭自然史》;要么通过整体而细微的想象,呈现万物共生、协同演化和退化的全球性的生态景观,例如《树语》。”

在青年作家、山东大学文学硕士李晓晨看来,好的生态文学作品应当对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持有一颗宽容、平等之心,坦然书写关于人与自然的秘密。“生态保护有着非常重要且深刻的现实意义,生态文学有很

多可以表达的书写故事。我们用生态文学的中国表达和国外的作家进行交流,在相互学习、相互促进下使其更具国际性和全球性。”

“我觉得这一次生态文学和自然诗歌的研讨是有划时代意义的。在世界和中国都很关注生态的时候,文学从来不会缺席,永远是人们精神追求的引领方向,但是它散落在各种题材和各个区域里。”中国十二背后·国际诗歌节主席、台湾《秋水》诗刊社长梅尔说,这次许多作家们来到绥阳,都惊叹于这里的生态和自然奇观。我希望生态文学能逐步走向一个系统化的探索,同时吸引更多的作家、诗人、学者等从事这方面的创作。

当前,生态文学创作的视野与面向正在逐步地打开、拓展,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,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新发展理念,势必将影响并改变生态文学的观念创新、取材、立意、视角和面貌。

(记者 向婧)



颁奖现场 (图片由主办方提供)



# 首届十二背后·十月“美丽中国”生态文学奖 第二届十二背后·梅尔诗歌奖 阿来、阿信等6人斩获大奖

本报讯(记者 向婧)9月4日,首届十二背后·十月“美丽中国”生态文学奖、第二届十二背后·梅尔诗歌奖颁奖盛典在绥阳举行。来自全国各地的部分著名作家、学者、诗人在绥阳以诗歌会友,交流切磋。

绥阳被称为“中国诗乡”,诗歌文化源远流长。“美丽中国”生态文学奖是《十月》杂志社携手贵州“十二背后国际旅游区”,面向全国设立的特色文学奖项,从而让作者以更多的洞察、更好的表达,去探寻人类与生命万物、与其他文明的关系,满足人民群众对“美丽中国”的畅想。

十二背后·十月“美丽中国”生态文学奖由中国有影响力的评论家、作家、诗人、艺术家、生态文学研究者组成评委会,中国作协副主席、评论家李敬泽担任评委会主席。首届生态文学奖评选范围为2019、2020两年参选作品。23名初选提名评委从近200部提名作品中挑选出15部入围作品,经过评委会评选,阿来凭借《云中记》获年度杰出作家奖;陈应松创作的《森林沉默》获年度虚构作品奖;半夏创作的《以虫在野》获年度非虚构作品奖;雷平阳创作的《修灯》获年度诗歌奖。

十二背后·梅尔诗歌奖是诗人梅尔

设立的独立诗歌奖,本奖为连续性的年度诗歌奖项,每年在绥阳十二背后旅游区颁发。在此次揭晓的第二届十二背后·梅尔诗歌奖获奖名单中,阿信获十二背后·梅尔诗歌奖年度诗人奖,西川获十二背后·梅尔诗歌奖中国诗歌终身成就奖。

据了解,依托于独特的自然资源和文化特色,绥阳十二背后旅游区把诗歌文化和自然山水、艺术教育、旅游相结合,诗歌精神与研学旅行互补,知识与实践结合,真正做到传承、创造、激发、探索,力求将旅游区打造为具有山水人文气质的艺术高地。



评论家李敬泽(左)为作家阿来颁奖 (图片由主办方提供)